

文章编号:1004—1877(2012)02—0088—06

## 延安文艺整风精神在国统区的传播与影响

庞虎 杨玉强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文艺整风虽发源于延安,但其影响已波及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内的诸多场域。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延安整风精神及文艺成果得以广泛传播,引起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思想变革。

关键词:文艺整风; 国统区; 中共南方局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艺整风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的浓彩一笔,曾在振奋民心、统一民力诸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催化推动作用。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虽已涉及较多,但仍显狭隘,学术界多集中于对延安场域文艺整风是非曲直的反复论证,而疏于对当时虽不够显赫但却已存在的国统区文艺整风运动的史实梳理,也就低估了延安文艺整风精神的场域影响和历史价值。

### 一

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环节,文艺界整风发端于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举行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该会主要为了“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sup>[1](P847)</sup>座谈会由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一百多人参加,共召开了三次:第一次会议于5月2日举行,毛泽东作了启发式讲话;第二次会议于5月16日举行,会议主要听取了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等人的发言,并对文艺界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党内外几十位同志发表了意见和建议;第三

次会议于5月23日举行,毛泽东对会议讨论的问题作了总结性发言。

毛泽东的讲话对文化战线在抗日救亡中的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同时讲话也指明了文艺工作者的整改方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今天的整风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讲话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必须改变旧式文人清高浮躁的作风,因为今天“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

收稿日期:2011—11—24

作者简介:庞虎(1978—)男,山东茌平人,博士学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1C038)。

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大后方也是要变的”。<sup>[1]</sup>(P847-846)

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西北文艺工作团、民众剧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地方艺术干部学校、边区小学教师联合会等延安各文化团体都立刻行动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界整风运动迅速展开。中共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国统区的领导机构,也对整风运动做出了积极响应,认为:国统区既要“防止由于目前趋势而走到左倾的过分乐观情绪”,又要“纠正由于不相信可以争取好转的右倾悲观情绪”,所以,“整风是目前不可懈怠的任务”。<sup>[2]</sup>(P845)

## 二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刻进行了学习部署,成立了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二十余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并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下设高级、中级、普通三个学习小组,学习活动依次推进,使文艺整风精神很快在国统区文艺界传播开来。

### 1、介绍《讲话》内容

在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媒介对讲话的宣传给予了大力支持。

1942年6月12日,《新华日报》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萧军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介绍了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情况。文章开篇提到“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接着又以“一、立场”“二、态度”“三、给谁看”“四、写什么”“五、如何搜集材料”“六、学习”“七、补充几个问题”为标题,<sup>[3]</sup>复述了毛泽东在讲话引言部分中的基本思想。这样,座谈会仅结束二十天,会议精神就以间接的形式传到了大后方。

1943年3月24日,《新华日报》又在“延安讯”中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为题,介绍了讲话结论部分的基本精神,写道“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以首页大部分篇幅刊载中共中央文委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消息……毛泽东同志去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文艺座谈会上之结语摘要,更在注目地位刊出。毛泽东同志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是此次会议的指针,也是文艺运动的总方向”。<sup>[4]</sup>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又以《新华副刊》整版的篇幅,在《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总标题下,分三个小标题即“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提纲携领地刊载了讲话结论部分的主要观点,并在“编者按”中指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两次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原文不可能全部发表,只好提要介绍一下。在这里三篇文章中,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的一篇,全部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另外两篇中加着引号的部分也都是他的原文,原文全部共二万余字,此地所节录出来的自然只能传达出其中若干基本论点”。<sup>[5]</sup>

另据当年在《新华副刊》工作的郑之东回忆:当时是被迫“采用‘化整为零’的战术,由副刊编辑室的三位同志把全文‘化’作三篇文章,采取能摘录原文尽量摘录原文,否则就用概述的方法来‘化’。然后分作几次跟别的稿件杂在一起送检”蒙混过关后,再“合零为整”,“加上醒目的大标题《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象轰雷一样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发表了出去”。<sup>[6]</sup>(P227)发表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又郑重声明“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新副》在今后也将以这个方针作为他的基本原则”。<sup>[7]</sup>

在此基础上,《新华日报》还在“读者和编者”专栏中大量转载延安文艺界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文章,如金向戈的《作家的世界观问题》、林洪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革》、肖三的《可喜的转变》、黄燧的《谈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林曦的《大众文艺小话》、德君的《谈“民族”化》等等,介绍了学习动向,扩大了讲话影响,还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曾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工作所提出的意见。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中已经经过长久的讨论,一致同意这些意见,而且把这些意见表现在他们的实际工作中去了。但由邮讯困难,我们无法加以详细报导,只能从间或看到的那些地区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转载出来……这些文章虽然已是半年或一年以前所写的,但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那里的文艺工作最近的动态。并且其中所述,对于大后方的文艺工作当也不无可供参考之处”。<sup>[8]</sup>

随后又分别于1月26日、3月10日、3月31日在《新华日报》第4版上以毛主席语录的形式,

发表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服从于政治》、《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农兵》等文。

1944年8月26日,《新华日报》还进一步转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工作中作品中的各种偏向,以便于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的服务于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sup>[9]</sup>后来,报社还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全文的单行本。

## 2、组织学习座谈

1943年10月,中央总学委发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号召各地党组织“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sup>[10]</sup>随后,延安等解放区掀起了学习讲话的热潮。

随着讲话内容在大后方的陆续公布,南方局也迅速行动起来,开始积极组织座谈会、讨论会,扩大对讲话的学习宣传。据南方局文委成员张颖回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组织当时文艺界朋友们学习。那时候,在曾家岩五十号临着嘉陵江的小屋,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小楼上,朋友们常常聚会,学习讨论,周恩来同志不管是偶然遇到或事先知道,他都很关心,哪怕是很繁忙或者是在两次约会之间的几十分钟,周恩来同志都

要和大家一起学习,谈一谈,给大家鼓舞”,<sup>[11] P47</sup>鼓励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讲话》精神,作为不断自我改造的思想武器。

在学习座谈中,周恩来等领导人还经常结合自身体会,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领会和运用《讲话》精神,来指导工作实践。例如:1945年刚参加“七大”返渝的周恩来,在一次重庆文艺界座谈会上提到,“他自己过去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还不能在工作中很好地运用。在延安经过整风学习,经过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他才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建议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来改进自己的工作”,他还肯定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在文艺界的表率作用和其文艺思想的指导价值,“他说,鲁迅起的是最好的作用。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在革命的文艺界,鲁迅的思想的革命性、深刻性和影响最大。创造社也起过很好的作用,冲破封建枷锁,也是进步的。他对郭老‘五四’运动的新诗作了肯定,说那些诗是革命浪漫主义,对青年影响很大。然后他讲到茅盾同志,这一段话讲得短一些。他先讲到文学研究会,肯定这个文艺团体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肯定它也起了好的作用,进步的作用。对茅盾同志,他肯定了他文学工作上的成绩,还提到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写的三部小说,《幻灭》、《动摇》、《追求》”。<sup>[12] P468</sup>借此鼓励文艺工作者发扬光荣传统,继续推动文艺运动的新高潮。

另外,南方局还利用各种文艺聚会,不失时机地推动讲话精神的传播,如:在1944年11月11日郭沫若招待柳亚子的宴会上、1945年1月26日文工会举办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招待茶话会上、1945年10月20日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1946年1月5日重庆文艺界追悼冼星海大会上、1946年1月30日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以演讲、报告等形式宣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指明了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还经常约见文艺人士个别座谈,及时指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例如:1944年底,周恩来约见了戏剧界部分编导、演员,谈到对抗战以来大后方剧运的感受,并提出了指导意见“抗战七、八年,我看了你们七、八年戏了。你们总高兴听听我这个观众的意见,我也极愿意谈谈个人看法。作为观众,我过去对你们总

是表扬肯定多于批评,基本上是表扬的,满意的。可是,我今天应该坦白地说,我对你们演的戏,越来越不够满意,至少没有以前那样满意了,这并不是说你们退步了,今不如昔了,而是形势发展,形势逼人。两年来,我每一次看了延安的各种演出,回来再看你们的,一次比一次明显地感到不满足了。毛主席《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队伍有了飞跃的变化,从文艺工作者生活、学习、精神面貌的变化,到作品和演出质量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这是学习《讲话》的结果,他敦促国统区文化人士也要继续努力,刻苦学习“在延安,在各个根据地的同志要学,在外面白区工作的同志更应该好好地学习”。<sup>[13]</sup>

### 3、借鉴延安经验

为促进国统区文艺界更好地学习提高,南方局还大量引介了延安经验。

1944年初,周恩来借赴延安筹备中共七大之机,特地选派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刘白羽等人,随同林伯渠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赶往重庆,介绍延安文艺工作盛况,推动大后方学习热潮。据刘白羽回忆:临行前,周恩来“特别叮咛我们首先到郭老那里去,把我们的任务、作法向郭老报告一下,听郭老的意见,请郭老主持”,刘白羽等人到达重庆后,立即赶赴郭老住所,“详细谈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情况,特别着重地介绍了毛主席讲话”。<sup>[14]</sup>第二天,郭沫若就召集重庆文艺界人士听取了何其芳、刘白羽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汇报。此后又多次在文工会组织学习活动。在一次“文协联谊晚会”上,周恩来应邀介绍了延安文艺界学习讲话后的新动向:延安文艺工作者“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sup>[15]</sup>还“用生动亲切的言语介绍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和收获”,<sup>[16]</sup>以此来激发大后方文化界的学习热情。

此外,南方局还大量引入延安践行《讲话》精神的文艺成果,供大后方文艺界学习借鉴。例如:“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sup>[17]</sup><sup>[1249]</sup>秧歌舞被带到重庆后,周恩来曾在《新华日报》社的广场上举行过多次歌剧晚会,招待大后方文艺界人士,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

等秧歌舞剧。当演到集体秧歌舞时,周恩来等南方局同志还“首先从座中参加进秧歌队,兴致勃勃欢欣鼓舞地扭了起来。应邀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立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去,队伍越来越长,情绪越来越热烈,观舞者的心情仿佛飞到了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大扭秧歌了。更动人的情景是,在广场围墙之外,报馆附近的居民,凡是跟工作人员熟识而又被认为是善良的劳动人民早已被让进来,席地而坐,看着秧歌了。不少人还拥在围墙外面,垫着凳子之类扒在墙上看。也有普通的警察,不好意思地摘下了制帽,看得出了神”。<sup>[13]</sup>歌剧《白毛女》也是延安实践《讲话》精神后产生的新作,周恩来返渝后以激动的心情向大后方文艺工作者介绍了观看《白毛女》演出的感受。据张瑞芳回忆:当时周恩来表示,“看重庆的演出,即使是比较好的,使人感动的程度也无法与看《白毛女》相比。因为这个戏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写出了被压迫阶级的命运和斗争”,他还提到叶剑英观看该剧的反映,“叶剑英同志讲: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过去看戏从不哭,而看了《白毛女》时却忍不住流泪了”,借此教育大后方文艺人士“思想要明确,要作党的好演员就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sup>[18]</sup>另外,周恩来从延安引入的音乐新作《七月里》、《纪念牌》以及“鲁艺”木刻新作等也都在大后方产生了良好影响。

## 三

延安文艺整风精神的传播,在国统区文艺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引起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变革。

### 1、认清了思想差距

随着学习《讲话》活动的开展,大后方文化界对以往的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在学习《讲话》过程中,一直在国统区工作的不少文艺家们,包括当时文艺界的某些领导同志,他们都以极为虚心真诚的态度回顾自己在国统区的工作,认为自己离《讲话》的要求,尚有很大距离”。<sup>[19]</sup>

在反思基础上,对文化运动中存在的错误倾向也进行了自觉清理和批判。例如:冯雪峰揭露了文艺运动的“革命宿命论”,认为它表现为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大家所熟知的公式主义”,也就是“政治上或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之在文艺作品上

的演绎或‘形象化’或‘艺术化’”；二是，文学写作上的“材料主义”，即作品的取材“来自预定的政治概念，并非和现实生活及斗争而俱来的思想内容”；三是，艺术创作中的“经验主义或繁琐的描写主义”，即面对现实的矛盾“不能靠尽量地客观的态度之力来解决，只得再矛盾的圈子里兜圈子”这些倾向必须通过“思想斗争，统一战线，大众化”的相互结合加以解决。<sup>[20] (P190)</sup>

此时的胡风也意识到某些错误倾向的严重危害，加入了批判行列。他揭露了文艺人士创作道路上的迷茫和徘徊状况，认为以往文艺界或强或弱地带有“游离了战争即历史要求的广大中间层的思想意识或生活态度的烙印”，产生了各种“有害的倾向”，甚至已经形成了“灰色的战场”：“有的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却顾影自怜地摸抚着自己的忧郁；有的讽刺丑恶的社会，但却发出了轻松的笑声；有的同情被封建压迫下的弱者，但却咏叹着悲欢离合的无常命运；有的表扬战争的信心，但却依靠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然因果；有的提倡现实的考验，但却是为了歌唱郎才女貌或郎才女也才的不幸分离或幸福结合；有的改写葬花词，寄托公子多情；有的特立授命记，赞颂豪绅气节；但最走红的却是那些既不脱离战争而又迷人的、在风沙的战场上的桃色传奇，那些既有‘革命性’又有诱惑力的、工农兵生活里的色欲故事……”这些倾向“此呼彼应，共存共荣地造成了一片混乱的迷雾”。<sup>[21] (P498)</sup> 这些倾向综合起来可归纳为“虚伪的主观公式主义”和“虚浮的客观主义”，其中，“虚伪的主观公式主义”是一种“抽象的爱国主义”，“只是简单地企图用抽象的民族气节动员人民参加战争，使人民成为战争的的工具的那种‘爱国主义’，已经完全转化成了抹杀历史要求的反动的武器”，在文艺上表现为，“苦心设计一个对于政治斗争现象的暗示，或者多情地编进一些对于历史韵事的感叹，但归根到底已经失去了‘思想教育的内容和力量’”。而“虚浮的客观主义”则是一种“好像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里“不但有‘现实’，甚至还有对于黑暗面的讽刺和光明面的描写，不但有形象，甚至还有对于形象的阶级特点的刻画，然而，读者满足了以后就反而心安理得地保持着和现实的历史要求游离的生活态度了”。追溯这些思想倾向的渊源，胡风认为是因为“作家的思想态度上没有和人民共运命的痛烈的主观精神要求”，于是，“黑

暗就不能成为被痛苦和憎恨所切实感受到的黑暗，光明就不能成为被血肉的追求所切实感受到的光明，形象就不能成为感同身受的爱爱仇仇所体现出来的形象了”，因而，在思想内容上，现实只能是“屈服在那局部性下面或漂浮在‘那表面性上面的‘现实’，反而把包含着矛盾和冲击的丰富的生活真实庸俗化了，把克服着痛苦和创造着欢乐的光明的人民道路虚伪化了”。<sup>[21] (P497)</sup>

## 2、明确了前进方向

通过学习检讨，大后方文化界得到了普遍的思想洗礼，进一步明确了前进方向，特别是更加坚定了文艺运动的人民立场，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意识，开始自觉遵循《讲话》指引的道路，努力开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例如：巴金在回忆录中把学习《讲话》看成是创作生涯中的“第二次解放”，感到“从旧思想的泥泞中解放出来”，“第一次看到了文学作为战斗武器和教育工具这一条道理”，“第一次明白文艺工作者应当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sup>[22]</sup> 郭沫若也感受到“跟着人类的历史走了两三千年的脱离民众的路，真象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窄到由对于极少数人的歌功颂德而至于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欣赏或甚至连自己都不懂的地步，愈艰深，愈晦涩，愈畸形，愈不成名器，便是愈高雅的东西，这路子已经走到最尖处了……任何文艺作品，凡是与下层生活脱离的，便都是歪辟的东西。文艺作品的价值和它与人民生活的距离成反比，距离愈大，价值愈低，距离愈小，价值愈大”。<sup>[23]</sup> 认为文艺的发展必须“深入农村，深入工场地带，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俗，一切喜怒哀乐的内心和外形，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只有把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改正过来，然后才能有真正的文艺作品出现”，<sup>[24]</sup> “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sup>[25]</sup> 茅盾也认为，文艺工作者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站稳立场，然后才能使自己的艺术真正为人民服务”。<sup>[26]</sup>

可见，《讲话》精神的传播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思想变革，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逐渐得到文艺人士的认同和推广，并成为文艺思想的主流。虽然由于特殊环境的影响，大后方文艺运动依旧面临

复杂困境,但“无论如何,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有了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内的文艺思想也就渐渐地有了向前进行的轨道了”,<sup>[27] P680</sup>“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影响之下的和人民群众结合的努力”。<sup>[28] P89</sup>这一思想的转变也必然带来了文艺创作的新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乡村文学在大后方异军突起开始成为文艺创作的一大亮点。例如:沙汀在《我的传略》中提到,“《还乡记》是四四年我奉调去重庆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返回故乡隐蔽在秀水镇一家锅厂里写成的。主要取材于我在刘家沟写《困兽记》时那段生活经历,我相信,如不学习《讲话》,《还乡记》的思想内容可能更差”。<sup>[29] P48</sup>1945年6月南方局庆祝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之时,还设立了“茅盾文艺奖”,公开征集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速写、报告文学,短短几个月内就收到作品一百多篇,获奖作品有:徐疾的《兴文乡疫政印景》、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木人的《丰收》、温士扬的《会议》、李俞的《还政于民记》、生群的《农村的一角》、夏培静的《么店子》、汪文孙的《风波》等等,这些都代表了大后方学习《讲话》后文艺发展的新成果。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M].重庆出版社.1990.
- [3]萧军.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J].新华日报.1942—6—12.
- [4]延安讯.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J].新华日报.1943—3—24.
- [5]编者按[J].新华日报.1944—1—1.
- [6]郑之东.回忆新华副刊[M].新华日报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 [7]读者与编者[J].新华日报.1944—1—2.
- [8]编者按[J].新华日报.1944—1—16.
- [9]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J].新华日报.1944—8—26.
- [10]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J].解放日报.1943—10—22.
- [11]张颖.恩情日月长—文艺家的挚友周恩来[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 [12]何其芳.回忆周恩来同志[M].何其芳全集(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13]于伶.噙泪忆教诲,深深怀念周总理[J].人民戏剧.1978(1).
- [14]刘白羽.雷电颂[J].人民文学.1978(7).
- [15]文协联谊晚会,周恩来应邀讲延安文艺活动[J].新华日报.1945—10—22.
- [16]巴金.望着总理的遗像[J].人民文学.1977(8).
- [17]郭沫若.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M].文学运动史料选(5).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18]张瑞芳.敬爱的周总理,文艺工作者想念您[J].文汇报.1977—1—7.
- [19]张颖.我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戏剧运动的看法[J].抗战文艺研究.1986(1).
- [20]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M].冯雪峰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21]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M].胡风全集(3).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22]巴金.第二次解放[J].文汇报.1977—6—11.
- [23]郭沫若.文艺与民主[J].青年文艺(6).1945—2—15.
- [24]郭沫若.向人民大众学习[J].文哨(1).1945—5—4.
- [25]郭沫若.人民的文艺[J].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艺术节纪念特刊”.1945—5—4.
- [26]茅盾.门外汉的感想[J].抗战文艺研究.1982(2).
- [27]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M].文学运动史料选(5).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28]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斗争[M].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 [29]沙汀.我的传略[M].沙汀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崔金路)

## The Propag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pirits of Yanan Literary Rectification in the Kuomintang areas PANG Hu ,Yang Yuqiang

( Marxism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rectification was launched in Yanan ,But its influence had spread to a lot of field including the Kuomintang are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outh Bureau of CPC ,the spirits and achievements of Yanan Rectification had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caused literary revolution in the Kuomintang areas.

**Key words:** literary rectification; the Kuomintang areas; South Bureau of CPC